



引用格式:张雪琴.《曾国藩家书》中的道德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4):28-36.

中图分类号:B8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4.005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4-0028-08

《曾国藩家书》中的道德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Thought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Home Letter of Zeng Guo-fan*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张雪琴

ZHANG Xue-qin

郑州轻工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现代性危机导致道德教化式微,进而造成当下社会道德不彰、家风不淳、官风不正、世风日下。《曾国藩家书》蕴含着丰富的修身、治学、齐家、为官的道理:修身之德贵在恪守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四守则;治学之德贵在不求功名富贵而求诚正修齐;齐家之德贵在孝悌、勤俭与睦邻;为官理政之德贵在清、慎、勤。曾国藩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法、榜样教育法、自我教育法、隐性教育法和因材施教法,很好地解决了子弟的立德问题。曾国藩的道德教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有助于化解人与社会的现代性危机,纠正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偏差,以良好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以官德修养根治腐败。

关键词:
曾国藩家书;
道德教化;
德性修养;
现代性危机;
腐败治理

收稿日期:2017-03-2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5BKSO03);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张雪琴(1980—),女,河南省商水县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强调,“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1]。家书、家训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道德价值观与当今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诸多义理相通之处^[2]。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湘乡曾氏家族因其良好家风的影响,至今人才辈出、长盛不衰。最能体现曾氏家族家训思想的是曾国藩写给家人的书信,后整理编撰成《曾国藩家书》,1500多封家书包含家常琐事、做人道理、治学方法、为政之道。本文拟以《曾国藩家书》为蓝本,重点研究曾国藩在修身、治学、齐家、为政等方面的道德教化思想方法及其在当代的价值,以求教于学界。

一、《曾国藩家书》中的道德教化内容

传统儒学将“内圣外王”作为读书人之终极理想,这一理想是通过“修、齐、治、平”的路径来实现的。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立德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受儒学影响至深的曾国藩在教育子弟时,非常重视道德教化,将立德贯穿其始终。

1. 修身之德

修身是儒家实现“修、齐、治、平”理想人格的基础,即一切事业的成败皆以修身为本。曾国藩一生都在践行修身的功夫,拜唐鉴习“静”、拜倭仁习“慎独”、订日课册、坚持写日记、改名“涤生”……他提出的“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四条修身要则,既有对先贤的继承和吸收,更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和省悟。

(1) 慎独则心安

慎独即谨慎独处,是指个体在无外在监督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凭借高度自觉,遵守道德规

范,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之事。曾国藩曾说,“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君子慎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3],认为慎独的伦理价值是用于区别君子与小人的,而慎独的实践意义在于心安。自修之道最难是养心,能慎独者,则能省己身;常省己身者,则无内愧之事;心无内愧之事,则笃定淡然。因此,慎独乃修身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

(2) 主敬则身强

曾国藩认为,主敬即“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功夫也”^[4]。此“敬”既是道德规范又是修身方法。在《居敬箴》中,曾国藩把居敬看成包医百病的良方,将“敬”列为日课之首,并提出具体实施细则:“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5]此后,他便守主敬至终身,不敢曾稍有陨越。

(3) 求仁则人悦

求仁指人要有博爱之心、宽容之心、慈悲之心。曾国藩曾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6]¹⁵⁵,意指要爱人和一切物类,要做到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曾国藩的求仁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是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怀。他认为,如果不能做到求仁,则是悖德之人;如果能够做到求仁,则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人悦即人人心悦诚服,是求仁的结果。

(4) 习劳则神钦

习劳指人应该用劳作来换取生存和社会地位。曾国藩认为,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但是,“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7]⁷⁶³。因此,他要求自己 and 身边人都要终身勤劳、刻苦学习,强调这不仅是创造财富的手段,还是磨练筋骨、锻炼意志的重要途

径,更是一种道德追求。

2. 治学之德

曾国藩将追求知识学问的目标首先确定在遵德性的人格修养方面,他在家书中写道:“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6]440}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是曾国藩治学的核心思想,也是其治学之德的基本理念,其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君子重于大官

君子即有德之人,是自孔子以降儒家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曾国藩一直以君子之德形塑自身、教化子弟。他认为“读书明理,志在圣贤”才是读书的目的,即读书是为了做德才兼备的君子,是为了德性修养的进步和提升,不能把读书求学作为升官发财的捷径。读书人若做不到《大学》中的“明德、亲民、止至善”,就背离了求学的初衷。之所以不能把当官作为求学的目的,是因为当官是一阵子的事,而做人是一辈子的事;官衔的大小不取决于自己,而学问德性的多寡则主要取决于自己。

(2) 进德重于修业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6]48}曾国藩认为,读书只为两件事,即进德和修业,所谓进德,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道,核心是孝悌仁义;所谓修业,即诗文作字,看读写作,提高自身本领。在此二事中,曾氏始终把进德放在首位,认为只有德行上进步,学业才能真正上进。所以他说: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亲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子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识字之牧猪奴耳”^[8]。

(3) 为学最要是虚心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常见朋友中有美

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冷笑,乃有进步也。”^[6]曾国藩曾谆谆教导诸弟子为学要戒骄戒傲,认为虚心是一种学习态度,是个人求知和进步的动力,亦是一种美德。他反对读书人轻率下结论,认为只有学习到一定程度才可以评论古人,读书人不要热衷名利,对知识还一知半解就想著书立说,这是心态浮躁的表现。

3. 齐家之德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承继了其祖父的“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八宝思想,其中,“书”为读书学习,“蔬、鱼、猪、扫”表示耕作自立,时刻保持寒士之风,“早”即不晏起,“考”为孝敬长辈,“宝”乃敦亲睦邻。他终身实践并将之写入曾氏家训中,坚持将读书修身、俭朴持家、孝悌睦邻作为“八宝”的核心精神,成为曾氏一门对子孙后代为人的基本道德要求。

(1) 孝悌乃齐家之本

孝是曾国藩齐家之德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也是其一生躬行履践的道德规范。在他写给家人的书信中,涉及孝友之道的就有数百封。曾国藩在写给长辈的信中,基本上都是先写日常琐事:一段时间内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家人身体如何等,看似繁琐啰嗦,实则是为了让家中长辈放心,也是在实践其“事亲以得欢心为本”^{[7]412}的理念。他还要求子弟将孝的范围扩大,不仅要对自己父母尽孝,也要对族中长辈尽孝。

作为长子的曾国藩,把悌即教导关爱诸弟作为孝敬父母的一部分,认为“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孝”^{[6]72}。他时刻谨记家族使命,认为自己要成长也要帮助兄弟进步。曾国藩家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写给其兄弟的,内容涉及治学、做人、持家、教育后代、带兵打仗、为官之道等。他时而

淳淳教导,时而严厉斥责,时而自我反省,时而与弟共勉。当兄弟对其无端怨恨和有不情之请时,他反省道:“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男深知此理,故禀堂上各位大人俯从男等兄弟之请。男之意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6]181}对待弟弟的不满,不责弟而责己,又曲意为之满足,体现了长兄的大度。

(2) 勤俭乃齐家之魂

曾国藩时常教导子孙要保持耕读之家本色,俭朴勤奋地过日子,不染宦宦子弟的纨绔习气,“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柴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必须一一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时时学习之”^{[6]348}。曾氏时常教育后代要自立、自强,并多次表示自己不会为子孙留钱财,说“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逸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6]250}。他相信节俭既是美德也能养德。在其家书中,随处可见他叮咛家人生活要俭之言。他曾赠联给弟曾国潢“俭以养廉,直而能忍”,并在信中多次嘱咐:“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6]1317}他还曾告诫儿子纪泽“吾观乡里贫家儿女愈看的贱愈易长大,富贵儿女愈看的娇愈难成器”^{[6]1631}。曾国藩远过庸常的眼光,正是他对子孙后代深厚永久的关爱。

(3) 敦亲睦邻乃齐家之道

曾国藩的“齐家八宝”中的“宝”指的就是敦亲睦邻。他在京为官期间,凡往家中寄钱,总不忘嘱咐留一份给族人和远亲,以敦亲睦邻。至于这样做的原因,他说:“一则我家气运过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

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6]103}“持盈保泰”,就是在鼎盛的时候保持低调谦虚,这样家运才能长久不衰。这也是他立志有“民胞物与之量”^{[6]55}的体现,他时常提醒弟弟们:“古来无与宗族、乡党为仇之圣贤,弟辈万不可专责他人也。”^{[6]144}

4. 为官之德

曾国藩一生倡导并践行“居官三鉴”即清、慎、勤,这是其官德修养的核心准则和行为规范。他曾作三字箴:“将此三字各缀数语,为之书解。‘清’字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9]后来,为了表述更加明晰,曾氏又将清、慎、勤改为廉、谦、劳。

(1) 居官要以清(廉)为先

在官德中,清(廉)、慎(谦)、勤(劳)三位一体。曾国藩认为,清廉乃为官安身立命之本,是第一准则。他反复告诫为官的弟弟:“为官莫作名利双收之想,‘勤廉’二字,系为政之本……要以‘廉’字自律。‘廉’则己身与随从之众一尘之染,自无蒙蔽偏祖之虞。”^[23]清廉不仅关涉官吏个人的德行优劣与官场上的进退成败,而且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衰存亡。有学者用大量的史实证明曾国藩在为官期间没有一笔公款进入个人腰包,他死后的遗产只有30万卷藏书和一座藏书楼。这是他清廉的佐证,也体现了他“藏书万柜可教子,遗金半两常作灾”的思想。

(2) 居官要以慎(谦)治骄

慎(谦)既是曾国藩修身之德的构成,也是其官德修养的重要准则。宦海沉浮多年的曾国藩用“以慎治骄,立于不败”时刻提醒自己。他将“慎”细分为三慎。一曰慎言。“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器

讼。静中墨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6]506}。曾国藩认识到谨言慎语的重要性,还指出前世卿大夫之衰、今朝官场之祸皆大多因多言长傲所致,因此,他认为为官一定要谨言慎语。二曰慎行。他反复告诫子弟,世间唯有谦谨是载福之道,骄佚则易败家。他要求诸弟时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骄佚”二字。三曰慎交。曾国藩特别注重良友的选择,弟弟们外出求学时,他告诫说:“择友则慎之又慎……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6]76}他常嘱咐家人不参与地方事务,不要与地方官员过多交往,即使交往,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

(3) 居官要以勤(劳)为本

勤(劳)不仅是曾国藩的修身齐家之美德,更是他为官之德的核心道德规范,他认为勤政是居官第一要务。为官之际,他常反省自己是否勤政,基本做到了自己在《劝诫委员四条》中所倡导的五勤,即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据《曾文正公年谱》记载,曾国藩“未明而起,黎明出巡查营垒,阅操练,日中清理文卷,接见幕僚。以其余时披览书中,不使身心有顷刻之暇逸。尝称:时局艰难,唯劳动心力者可以补救”^[11]。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的官德境界不止于此,他还提出为官要勤而不夸、劳而不求功名。在家书中,他多次要求“吾兄弟既誓拼命报国,无论如何劳苦,如何有功,约定终始不提一字,不夸一句”^[12]。

二、《曾国藩家书》中的道德教化方法

曾国藩认为,在立德、立功、立言当中,立德最难,其不是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的修养才有所成,尤其需要采取一些必不可少的道德教化方法。《曾国藩家书》中的道德教化方法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

1. 理论与实践结合法

理论教育法与实践锻炼法是现代德育方法论中的基本方法。前者是向受教育者灌输教育内容,以理服人,使人心悦诚服;后者是让受教育者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其优良品德和行为习惯。曾国藩对子弟的道德教化,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事实、摆道理,此乃理论教育法。除此之外,他还注重实践锻炼法。他主张“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6]94},如谈及孝道,要求子女做事要让长辈以得欢心为本;论及节俭,要求子女亲自添茶倒水、拾柴耕种;论及求知与躬行,他对不善于诗文的弟弟表明自己的态度,躬行重于求知:“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污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的好,亦只算个名教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悌’两字上用功?”^{[6]94}他回家省亲必吃儿子亲手栽种的蔬菜,在京为官必穿家中女眷亲手做的衣和鞋。通过这些方式,曾国藩较好地达到了鞭策儿女学会做人、塑造儿女们高尚人格和灵魂的教育目的。

2. 榜样教育法

榜样教育法是以具有代表性的人或事进行示范,帮助和启发教育对象,以提高其道德水平的一种教育方法。这种方法旨在通过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来进行教育,激发教育对象产生思想情感共鸣,引导其学习、对照和仿效。与说理教育法相比,榜样教育法更富有感染力和可接受性。曾国藩曾说,做好人、做好官、做好将,俱要好师、好友和好榜样。他一生奉“内圣外王”为圭臬,以圣贤为榜样,严苛要求自己,在“修、齐、治、平”上有所作为,成为家族道德学问之楷模。他不但要求自己 and 诸弟以身垂范教子侄,还将自己最崇拜的32个圣贤写进其《圣哲画像记》中,并言“此三十二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13]。文

章写成后,他要求儿子设法寻找这32位圣哲的画像,并一一画好,存于家塾,作为家族子弟学习效仿之榜样。

3. 自我教育法

自我教育法是教育对象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管理、自我鉴定,自觉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方法。在儒家推己及人、修己安人的修身活动中,修己是根本。因此,曾国藩非常重视修身养心的方法。早年为克服不恒的毛病,他订日课册,日课内容包括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谨言、养气、保身、作字、夜不出门等,自30岁后一生遵守,可见对自己要求之严。他还坚持写日记,并在朋友间传阅,以督促自己除掉恶习。“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6]56}他总结出一套以思诚为根本,以居敬、主静、慎独相配套,以日课、研几等为操作途径的内省修心方法体系,并将之传给后人。

4. 隐性教育法

隐性教育法是将德育内容渗透到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使教育对象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的一种教育方法。曾国藩认为,环境好坏对一个人成功与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庭环境对人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在给父母兄弟子女的书信中,他反复叮嘱要打造“耕读孝友之家”。他还看到社会环境对人的成长有很大影响。为了让孩子远离京城官宦子弟以免养成不良习气,他虽在京为官,却让夫人带着孩子在湖南老家居住学习。他积极为兄弟子侄择良师选益友,为他们营造好的教育环境。在选择老师方面,他的标准是不但要学问好,更要人品好,在给儿子曾纪泽选择老师时他写道:“研生兄(纪泽老师)亦山林寒苦之士,决无官场习气,仅可放心。”^{[6]389}“明年请师,仍请邓寅皆先

生。人品学问,皆为吾邑第一流人。”^{[6]559}在择友方面,他告诫诸弟和子侄,一生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一定要慎之又慎。

5. 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法是从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即个体差异出发进行有差别教育的一种方法。曾国藩曾经用诗对三个弟弟分别做出了鉴定:“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14]辰君是曾国潢,天智才干平平;午君是曾国华,很有才华;老沅是曾国荃。针对几个兄弟的不同特点,他分别对之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要求。对于敢闯敢干却狂傲的曾国荃,在肯定其优点的基础上指出了其不足:“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35];而对于为人谦卑的曾国葆,则在肯定其谦虚可爱的同时,指出他还要自信自强、勇于进取;而对于才智平庸的曾国潢,则安排其在老家主持家务,上孝父母,下教子侄。对自己的两个儿子,曾国藩亦同样在深入了解他们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的教育方法。他因材施教的方法,有的放矢,针对性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主持家务的曾国潢秉承半耕半读之家风,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曾国荃军功赫赫,封一等伯爵,成为封疆大吏;大儿子曾纪泽成为晚清知名的外交家,二儿子曾纪鸿成为近代知名的数学家。

三、《曾国藩家书》中道德教化思想之当代价值

不可否认,一切传统的道德思想和文化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中的思想精华不会因朝代更迭、历史变迁而失去其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36]《曾国藩家书》中的道德教化思想在今天就具有这样的价值。

1. 以修身为本的内向超越修补现代性危机

儒家推行的修身之道是一种内向超越的方法,作为一代大儒的曾国藩,认为修身是其“成圣”的必经路径,践行《易经》所言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终身学习理念。他曾写下“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警句以自勉,一生无时无刻不在以经世致用为核心,以追求至善为目的,坚持自修之道,以内向超越为本,将内向超越与外向超越结合起来,力争做到“内圣外王”,被后人评价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重视内向超越的人,不会怨天尤人,凡事都反求诸己。有此境界,生活自然幸福。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现代社会应鼓励人们从内向超越中找寻智慧,重视修身,有效地约束自己的物质贪欲,进而克制征服性技术的发展,摒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唯如此,才能走出现代性危机,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2. 以至善为学观纠正功利主义教育的偏差

现代社会,功利性教育倾向越来越严重。为就业前景而学、为晋升加薪而学、为职称名声而学,盲目求学、跟风求学、读书无用论等,都是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反映。过分强调教育的功利性,会导致受教育者情感的逐渐缺失和人格的逐渐矮化。在那些通过教育而“成功”的人士中,不乏自私和失德之人,发展到最后,有可能出现坏人统治好人、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如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将教育回归其本真目的。《大学》将教育的目的界定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曾国藩将此看作为学的最高目标。他提出读书不是为了功名,而是为了做明礼诚信之君子;读书重在进德与修业,在二者发生矛盾时,进德重于修业。他还主张读书要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结合起来,即“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

之完人……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6]155}。在曾国藩的教育理念中,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形成个人的小善和社会的大善。这种教育理念提醒我们:只有将德性道德教育、人格完善教育当作教育之终极关怀,才能实现个人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统一。

3. 以良好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

家庭是社会最基础的组织细胞,家与国紧密相连。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近几年,国人热议家风,表面上看是对一己之家的关怀,其实是对当下家庭道德领域中诸多问题的深刻反思。当下中国的家庭结构与曾国藩时代有很大不同,现代家庭基本是“一代化”“小型化”模式,核心家庭成为家庭的主要形式,老人逐渐被边缘化,家庭代际关系模式、家庭功能、家风传承方式亦发生了变化。但是,若能将曾氏的孝悌、勤俭、敦亲睦邻进行现代性转化,依然能给今天的家庭道德建设以启示。

经久传唱的歌曲《常回家看看》,道出了现代社会父母子女的关系越发向着平等相处、超越功利的方向发展。曾国藩曾说“事亲以得欢心为本”,这实际上是提醒现代人孝顺父母应该关心父母真正需要什么,子女平安幸福、抽出时间用心陪伴,或许是当下许多老年父母最在意的。曾国藩认为,践行“兄友弟恭”既是一种家族责任,更是孝顺父母的一种方式,在男女平等的今下社会,悌道可以转换成兄弟姐妹之间和睦相处的原则,即家庭内部责任和义务重于回报与索取。

曾国藩常以书信告诫家人要敦亲睦邻,将谦虚待人、为家族创造好的周围环境,视为保家

之道。当今天社会的邻里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曾氏所处的传统社会相比亦有许多不同的新特征,但是曾国藩处理邻里关系的经验和道德要求,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现代城市人生活节奏加快,大多数社区不是以血亲关系或同事关系为基础的聚居,邻里关系生疏,互帮互助亦少见,造成了城市家庭生存的孤独感,邻里之间因为私占车位、噪音扰民、宠物惹事、乱扔垃圾等而产生的矛盾层出不穷。法律和规则不能完全解决这种现代城市病,还是要回归到道德和人心,要让人们认识到“和”与“恕”的价值,要让人们意识到良好的邻里关系于社区治理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

4. 加强官德修养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做官先做人,从政先立德”,官德淳则民风正,领导干部的官德修养关乎政治清明、人民福祉和国家长治久安。曾国藩的官德修养虽然有其时代性和阶级局限性,但其中的道德力量对当下的反腐败工作仍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7]道德准则既有时代性,又有历史联系性和继承性。我们应该将曾国藩为官的“清、慎、勤”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新的内涵,将之作为党员干部为政的基本准则。曾国藩深知“吏畏吾廉、民服吾公”的道理,坚持“唯俭可以养廉”的理念,始终以“节俭、节用、节欲”自律,反复训诫家人不要追求奢靡、贪图享受,要求下属不贪财、不苟取。这些做法启示今日为政之人:为政清廉方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民心,公务人员必须恪守廉洁自律的职业道德观,不廉不足以立身,要坚守规矩、把牢道德底线,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增强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曾国藩将为官之“勤(劳)”细分为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这启示我们:要大兴实干之风,勤政为民,谨记“功崇唯志,业广

惟勤”,“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当下,我们将曾氏的“五到”与当前社会形势和工作结合起来,赋予其新的内涵:“身到”就是要亲自深入到群众中去,探访民意,了解民情;“心到”就是要做到心为民所想,情为民所系,时时以民生为念;“眼到”就是要及时了解各种公文、文件,把握相关政策会议精神,及时关注民生新情况新问题;“手到”就是要及时处理工作,不推诿、不拖拉,并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工作方法做好备案总结;“口到”就是要做好党和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宣讲工作,与民众平等细心交流,及时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四、结语

现代性危机导致道德教化式微,进而造成当下社会道德不彰、家风不淳、官风不正、世风日下。对于这些问题,《曾国藩家书》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同时,我们应寻觅一条走出困境的道德教化之路,重构传统德性道德价值体系,将德性道德与规范道德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自己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准确位置,处理好个人与他人、自然、社会的关系。

要实现德性道德与规范道德的恰当融合,构建新的德性道德价值体系,我们要做到:用规范道德来约束人、完善人、引导舆论、改善民风,让道德规范像法律一样成为调解人们基本行为之必需;使传统独白式道德教化走向现代对话式道德教化,引导个体对行为和动机进行深刻反思,不断在反省中自我扬弃、净化心灵、提升觉悟;加强道德教化的载体建设和环境建设,让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社会要素与传统道德教化相融合。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

- 讲话[EB/OL]. (2016-12-15)[2017-15].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15/c_1120127183.html.
- [2] 曹洁. 诸子“家训”类文献的齐家之道与和谐社会
的文化建设[J]. 河南社会科学, 2016(3):
109.
- [3] 唐浩明. 唐明浩点评曾国藩语录:上[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170.
- [4]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家书[M]. 长沙:岳麓书
社, 1985:1393.
- [5]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家书[M]. 长沙:岳麓书
社, 1987:138.
- [6] 曾国藩. 曾国藩家书全编[M]. 北京:中国华侨
出版社, 2011.
- [7] 唐浩明. 唐明浩点评曾国藩家书[M]. 北京:华
夏出版社, 2009.
- [8]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家书[M]. 长沙:岳麓出
版社, 1995:39.
- [9]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日记[M]. 长沙:岳麓书
社, 1987:802.
- [10] 吴江, 袁敏琴. 曾国藩成就大事的 36 字诀[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7:185.
- [11] 黎庶昌. 曾国藩年谱[M]. 长沙:岳麓书社, 1986:
76.
- [12]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家书[M]. 长沙:岳麓书
社, 1986:878.
- [13]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诗文[M]. 岳麓书社,
1986:251.
- [14] 李志茗. 曾国荃与晚清官书局刻书[J]. 厦大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5):134.
- [15] 曾国藩. 曾国藩治家全书[M]. 长沙:岳麓书社,
1997:45.
- [16] 习近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
时的讲话[EB/OL]. (2014-01-01)[2017-
01-20]. http://www.wxyjs.org.cn/zyldrhd_547/201401/t20140101_147332.html.
- [17] 习近平.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
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EB/OL]. (2016-01-
12)[2017-01-20].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03/c1001-28319087-2.html>.